



马克思主义新视野丛书

解放的界限

——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1921~1949）

JIEFANG DE XIANJIE
Zhongguo Gongchandang de Funü Yundong

张文灿◎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新视野丛书

解放的**界限**

——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1921~1949）

JIEFANG DE XIANJIE

Zhongguo Gongchandang de Funü Yundong

张文灿◎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放的限界 / 张文灿著.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620-4956-2

I. ①解… II. ①张… III. ①妇女运动—历史—研究—中国—1921~1949
IV. ①D44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3126号

书 名 解放的限界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8908325 (发行部) 58908334 (邮购部)

编辑统筹 第三编辑部 010-58908289 zonghebianjishi@gmail.com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规 格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10.75 印张 290 千字

版 本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0-4956-2/D · 4916

定 价 32.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目 录

绪 论	从“解放妇女”到“让女人自己说话”	1
第一章	妇女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起源	13
第一节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妇女问题	14
	一、戊戌维新时期的“国民之母”	14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国民”	19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	24
第二节	妇女解放与阶级、社会解放的结盟	30
	一、五四“新女性”的困境	31
	二、反思欧战与西方女权运动	34

三、苏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	36
本章小结	40

第二章 性别的彰显与隐约：1921~1927 年的中共妇女

运动	41
第一节 建党初期的妇女工作	41
一、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相伴而行	42
二、中共早期的妇女领袖与妇女工作	44
三、工人运动中的性别合作与分歧	50
第二节 国民革命中的妇女统一战线	54
一、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女工运动的联合	54
二、在国民革命中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	56
三、北伐战争中的妇女解放风潮	61
第三节 共产国际对中共妇女运动的影响	64
一、妇女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隐约与彰显	64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妇女运动的促进与限制	69
第四节 早期女革命者的群体肖像与个人境遇	75
一、早期女革命者的群体肖像	77
二、早期女革命者的个人境遇	84
本章小结	97

第三章 阶级与性别的交织：1927~1937 年的中共妇女

运动	99
第一节 从女工运动到农妇运动	100
一、中共妇女政策的转变	101
二、井冈山时期的妇女运动	105

第二节 中央苏区社会改造运动中的解放妇女	113
一、社会改造运动的性别视角	114
二、中共领导下的妇女组织	118
三、解放妇女的政策与实践	122
第三节 中央苏区妇女对阶级革命的差异化选择	145
一、妇女对阶级革命的参与	145
二、妇女与阶级革命的疏离	157
第四节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中的阶级与性别	162
一、妇女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	163
二、革命阶级内部的性别冲突	168
三、在阶级利益与性别平等之间寻求平衡	176
本章小结	178

第四章 民族战争中的性别议题：1937 ~1945 年抗日根据地的 妇女运动

第一节 民族危机下的中共妇女政策	180
一、抗日根据地妇女的生活境遇	180
二、以民族解放为宗旨的妇女动员	185
三、抗战初期中共妇女运动的局限	196
第二节 解放妇女的理想与现实的困扰	201
一、保障妇女权益的政策及实践	201
二、农妇的觉醒与新问题	214
三、知识女性的抗争与转变	218
四、解放妇女的现实困境	222
第三节 1943 年妇女工作重心的转移	228
一、反思妇女政策的“四三”决定	228

二、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	231
三、做“新贤妻良母”	235
第四节 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三重面相	239
一、面相之一：妇女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贡献	239
二、面相之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248
三、面相之三：妇女对苦难的记忆与述说	253
本章小结	263
 第五章 走向新的起点：1945～1949年的中共妇女运动	265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妇女运动的方针	265
一、抗战结束时中国妇女的迷茫	265
二、解放区妇女运动的“四结合”	267
第二节 解放区妇女运动的开展	277
一、妇女与土地改革	277
二、妇女与生产运动	284
三、妇女参战、支援前线	289
第三节 1949年的中国妇女	293
一、妇女领袖的感受与思考	293
二、知识女性的多元化选择	300
三、沉浸在传统中的劳动妇女	303
本章小结	305
 结 语 妇女解放的机遇与限制	306
参考文献	324
后 记	335

▶▶ 绪论

从“解放妇女”到“让女人自己说话”

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的日益展开，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理论及实践，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呈现的立场、理论资源及方法的演变说明，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和思想状况会生成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表述问题的方式。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创新，新的研究方法及视角可以为我们分析同一问题开拓不同的论说空间，带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研究效果。但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必须从中国问题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否则就可能产生貌似深刻的偏见，削史实之足，适理论、方法之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甚至产生伪问题。

一、解放妇女：民族国家立场主导下的中共妇女解放运动与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近代中国反抗殖民压迫、寻求国家走向独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实践。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包括妇女领袖向警予、邓颖超等，对作为性别群体的妇女，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果放在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考察的话，妇女解放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源自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日益产生的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从晚清时期的维新知识分子倡导妇女做“贤妻良

母”以承担对种族、国家的母性职责；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动员“女国民”直接投身革命来贡献国家；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疾呼妇女“人格独立”从而奉献社会。^{〔1〕}他们关于性别问题的理念实际上是一脉相承、殊途同归的，即妇女问题不单纯是性别关系问题，妇女也不是被看做独立的权利主体，而是被当做一种有利于建构民族国家的社会资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妇女解放问题纳入阶级、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形成了妇女解放与独立民族国家建构的结盟。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妇女问题的基本立场，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妇女整体看做被压迫阶级；妇女作为生产与家庭奴隶的双重身份使她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以实现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与男性无产者一起，消灭私有制、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成为妇女解放的现实途径。

这种建立在民族国家立场上的妇女解放观点，用研究者的表述，重在说明：“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冲破不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将妇女解放理解为超越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而单独进行的参政运动、教育运动、生产运动等的狭小范围，妇女解放运动也就会失去重要依托而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

〔1〕“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借用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资源探讨中国女子解放问题，其主旨实则仍指向社会。胡适“美国的妇人”一文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美国妇女的自立性是中国妇女最为缺乏的，但他强调：“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胡适：“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

的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1〕}这既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妇女运动的核心立场，也是长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的主流表述。

基于这样一种立场，有关中共妇女运动的研究文献，革命者的传记、回忆录及大多数研究著作、文章等，主要从两个方面描述和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妇女运动的政策与实践：一是妇女的利益与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性别压迫与民族、阶级压迫具有同构性。妇女占中国人口的一半且处于被压迫的底层，妇女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社会的解放。反之，压迫越重，反抗越大。妇女是社会解放的重要力量，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解决妇女问题上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因为中共通过政策干预和社会动员，在革命过程中为妇女解放提供了体制保障。在各根据地制定的社会改造方案中，保护妇女权益成为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中共通过制定颁布一系列婚姻法案来保障妇女的婚姻自由；通过分配土地、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来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通过教育培训、出台妇女干部选拔的具体指导意见来体现和落实妇女的平等参政权等。总之，中共的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受压迫的悲惨命运。

由此，有关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的表述形成了典型的“压迫—解放”模式，其阐释重心主要是政治性的，区分妇女的身份的主要是阶级，妇女解放的标志和检验妇女政策正确性、有效性的标准是妇女的阶级地位是否有所改变和提高。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但“地位”的内涵是什么？衡量“地位”高低的指数、标准是什么？怎样算

〔1〕 韩廉、李斌：“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及其启示”，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高？怎样算低？似乎是约定俗成、不证自明的。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注重对中共妇女解放运动作宏观、整体性的描述与分析。纵向上，把妇女运动作为中共革命实践的一个子问题，以时间为线索，分为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横向上，把妇女群体视做利益一致的共同体，从经济、政治参与、教育、婚姻等不同领域论证中共妇女政策带来的妇女地位的提高。在这个框架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威武雄壮的“大”场景，是带有普遍性的、作为群体的妇女，是“被解放”的妇女的历史。而日常生活场景中不同身份的妇女个体，常常处于失语状态。

二、被搁置的性别议题：从女性主义立场对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的再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后期，一些论者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检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包括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性别问题被民族国家、革命的宏大叙事遮蔽和弱化了。中共的妇女解放运动重视同一性别内存在的阶级差异，从立法、政策到实践上保障了广大无产阶级妇女和农妇的利益；但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同一阶级内两性间存在的等级秩序问题。

有论者指出：“从国共两党在 1927 年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至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就不再是独立的争取妇女权利的行动，而被纳入到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总目标中。但争取妇女解放仍是共产党的主要工作。这种性别之间的‘公开利益的一致性’和‘隐蔽的紧张关系’，一直是革命队伍中处理性别关系上的棘手的问题……不只是婚姻关系，革命和家庭角色分工方面也出现了冲突。”〔1〕论者用大革命时期妇女领袖向警予与丈夫蔡和森之间的感

〔1〕 杜芳琴：“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与性别关系”，载《浙江学刊》2001 年第 1 期。

情纠纷、延安整风时对知识女性的批评等事例，来揭示革命队伍中男性主导下的性别紧张关系。而中央苏区时期婚姻改造运动导致的男性农民的抵制等，更是屡屡被论者作为起引证作用的案例。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普通农妇，都面临着婚姻、家庭关系上的两难处境。

事实上，类似的观点在延安时期，就由丁玲、林学昭等革命阵营内的知识女性通过自身的经历及对所处的社会氛围的感受表达出来了。虽然延安的女性与男性拥有同等的工作权利，“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但女性“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谏议”。^{〔1〕} 丁玲提到的已婚生育女性在兼顾工作和家庭两方面任务时遭遇的困境，触及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而在当年，这样的观点被作为“右”的倾向，即“以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观点”，“只和上层妇女进行团结”，“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脱离了广大工农劳动妇女”^{〔2〕} 而遭受批判。

当代的女性主义者之所以把当年中共革命阵营内没有得到解决的性别问题重新提出来，并形成对传统妇女解放观点的质疑和挑战，一个直接的背景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90年代后比较系统地翻译和引入中国。这一阶段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被论者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第二阶段，以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70年出版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为理论标志。该书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教育、强权、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批判了男权中心主义，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是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与此同时，20世纪上半叶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西蒙·波

〔1〕 丁玲：“三八节有感”，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

〔2〕 蔡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妇女”，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27日。

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等被重新发现，它们与新的著作一起，构成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主流话语。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些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直接理论资源。^{〔1〕}

论者借用西方女性主义反抗男权中心的立场，认为妇女解放属于性别范畴，需要在性别文化框架中重新审视两性间不平等的问题。她们揭示了中国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运动的差异，“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则大都与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相伴生；而且极为有趣的是，大都首先由男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存状况间或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方式之一，成为控诉前现代或殖民时代社会暴行的最佳例证，成为传播、印证现代性话语的成功途径。”^{〔2〕}坚持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者试图说明，中国的妇女解放与民族、阶级解放运动尽管在建构现代国家的使命中结盟，但并不能被民族、阶级问题全部覆盖。中国妇女解放的主体是男性政治精英，他们为女性代言，以政治合法性置换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女性主体性，这使得涉及性别权力关系的议题在男权视域下被边缘化，呈现出来的是民族国家话语。

至此，参与中共妇女运动的历史当事人似乎还沉默着。她们先是在自己生活的年代，由启蒙和革命的男性代言；如今，则由女性意识强烈的后代姐妹们代言；她们自己真的就无声吗？

三、让女人自己说话：历史当事人的诉说及跨学科对话

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中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这样写道：“对中国妇女而言，一个世纪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女性的苦难之外，确实还有沉重的国难和家难；在‘妇女权利’之上，确实还有民族存亡和阶级压迫问题；在

〔1〕 赵稀方：“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2〕 戴锦华、陈顺馨编：《妇女、民族、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男女平等’之中，确实还有于全社会都十分要紧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贫困问题……于此，中国妇女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历史反应：很大气，很壮阔，无论你怎么启发和诱导，它的立场远在女性主义之上；的确更像是‘民族的’和‘社会的’，而不尽是女性的——倘若我们只是把它禁锢在女性主义的理解框架中，也会委屈或曲解了她们的声音。”〔1〕

为何论者要超越于女性主义的立场呢？“让女人自己说话”给出了回答。它不是历史书写者带有后见之明的审视与反省，而是事件参与者或见证人的叙述。它尽量避免为历史中的妇女代言，而是以真实的生命体验说明历史事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妇女解放运动对妇女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有资格发言的就是身处事件中的妇女们。历史研究要寻找的真实性，不仅是被因果关系所笼罩的逻辑论证，更应该是鲜活的、丰富多彩的个体生命经验的再现。毕竟，“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正如论者所言：“个人感受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它对人的影响不会随岁月流逝而流失，相反，可能更加强了。”〔3〕

“让女人自己说话”是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突破，它借鉴了人类学的口述方法及田园调查搜集资料的方法等。从事妇女史研究，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史料的缺乏，因为传统史学依据的主要是官方文献，大多关注的是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而亲历事件的普通人的声音却常常被忽视，妇女更是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将口述的方法运用于妇女史研究，为女性提供了讲述历史的机会。它关注的是：究竟谁在述说历史？怎样述说？为何这样述说？它试图

〔1〕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3〕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通过妇女自己的声音，呈现妇女与阶级、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强调它们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作用。即妇女解放与阶级、民族解放既不是同一个问题，也不是完全对抗的，而是具有张力的异质同构体，是一体多面的。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并不纯粹是被解放的客体，她们有主观能动性。比如从以下例举的当事人叙述中，或可观照出一些妇女参加中共革命的动机：

“9岁那年就做童养媳，从小嫁给人家，好可怜，因为共产党可以解放我们，使我们有个出头之日，所以共产党红军来后，我参加了工作。”

“当时我们家里比较穷，从小离开我母亲，把我给了人。我很早就听说红军要来，还没有引（夫家娶媳妇进门）的时候，红军就来了。我们9个（在一起的小姐妹）一块儿都参军了。”〔1〕

“在衡阳女子师范学校，我最感兴趣的是看小说和体育运动；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从小立志当巾帼英雄的我，渴望当兵；在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报名表上姓名栏里我填上了‘曾志’二字，同学问我为何改名，我说：‘我就是要争志气。’”〔2〕

这些叙述显示出她们多半是自愿的，她们把参加中共革命作为改变命运的契机或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这就有别于我们通常认为妇女是被迫卷入战争的认识。所以，“让女人自己说话”并不否认女性主义的立场，而是在此基础上，从中国情境出发，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差异化”表现出来。所谓“差异化”有两层涵义：

〔1〕 李小红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页。

〔2〕 曾志：《一个革命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一是要看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现代女权运动的差异，及由此给中国妇女解放带来的双重作用。二是要看到妇女群体的差异。人有多重维度和身份，除依性别分为男女两种群体外，又依种族、民族、阶级、宗教等划分为其他群体，它们与性别等级呈交叉态势。如果仅仅从性别立场出发考察妇女问题，同样可能造成对历史的误读。

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由妇女独立发起，并以反抗男权为中心，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迫使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她们面临的压迫主要来自于国家内部的男权制。所以，西方女权运动一直被男性利益集团视为威胁性别秩序的潜在力量而备受压抑与控制。而中国近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自然经济以及建筑于其上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大部分女性尚未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和比例也很低，很难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同时，近代中国遭遇西方的殖民统治，不仅女性，包括男性都是受压迫者。在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

当然，妇女解放与阶级、民族解放的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并不是对等的，而是充满张力的。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二者互为依存。在妇女的利益与以男权为中心的阶级、民族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妇女的利益要让位于阶级、民族的利益。正如论者指出：“从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展开的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来说，相当程度地借重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也就是说，至少在乡村家庭中，男权中心的性别模式依然存在，女性介入公共领域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往往是在不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自主性，但也导致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即

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承担家庭劳动。”〔1〕出于维护革命阵营的稳定和党的民族解放事业的顺利发展的目的，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并没有被质疑和改造，这是妇女得到有限解放的根源。

另外，“马克思主义史学较多地注意了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同一性，而没有过多论述二者的差异与交叉；而西方早期的妇女史学家又过多地强调了性别压迫，将妇女视为一体，忽视了妇女群体中的种族、阶级等各种差异与矛盾。”〔2〕这就凸显出差异与共性这样一组重要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问题。有论者以中共在中央苏区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婚姻等政策为例，剖析了阶级与性别为何、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3〕研究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应该是承认妇女这个性别共同体有着共性、整体性。但是，妇女这一群体实在包罗太大，不仅横向包含不同种族、民族、阶级等，而且纵向包含不同时期的妇女。如果再考虑到空间因素、社会制度因素等，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并不比两性之间的差异小，它造成了历史上妇女生存状态的多样化。所以，我们对中共妇女运动中的妇女群体进行研究，能够把握历史的规律性及方向感；注重个体或某一视角的研究，有助于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如果执其一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研究，就可能致使妇女史研究的结论要么失之笼统，要么碎片化。

四、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及视角

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运动，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国家民族、阶级革命的

〔1〕 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 高世瑜：“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3〕 这方面的文章，有宋少鹏的“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性别与阶级”（载《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1期），郭静的“苏区的阶级与婚姻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贺桂梅的“‘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等。